

话语权视阈下维护 意识形态安全的“三重逻辑”^{*}

曹建文

【内容提要】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话语权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掌握和提升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内容。掌握话语权，往往就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掌握主动。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争夺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掌握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提升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须基于问题意识多措并举。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理论阐释，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演进进行历史梳理，进而对提升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进行实践探讨，是话语权提升视阈下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三重逻辑”。

【关键词】话语权 意识形态安全 意识形态话语权

作者简介：曹建文（1975-），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特聘教授，光明日报社理论部高级编辑（北京 100062）。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话语权与意识形态密不可分，掌握和提升话语权是意识形态工作的重中之重。话语权对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至关重要，掌握了话语权，往往就能在意识形态斗争中掌握主动。话语权的争夺，实质上就是意识形态之争。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争中，增强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创新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的话语体系显得尤为重要。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进行理论阐释，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演进进行历史梳理，进而对提升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进行实践探讨，是话语权视阈下意识形态安全建构的“三重逻辑”。

一、理论逻辑：争夺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必然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①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党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灵魂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根本。在中国，要掌握和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强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主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意识形态安全的文化审视研究”（18BKS039）的阶段性成果。

①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1页。

流话语权中的地位，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实践课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虽未直接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概念、范畴进行详细论述，但在其关于意识形态的经典论述中，却包含着丰富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为此，我们须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关于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思想进行溯源和梳理，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掌握和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思想来源和理论依据。

1. 何为意识形态话语权

意识形态话语权，从字面来看包括“意识形态”和“话语权”两个部分，亦此，“意识形态话语权”关涉两个关键词。一方面，意识形态以话语为载体，表达意识形态主张。马克思认为意识形态与话语并存，话语体系随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而变化发展。意识形态是一个国家的政治上层建筑，它集中体现了统治阶级的利益，直接服务于统治阶级巩固政权的需要。而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载体，一个国家要对内对外维护和巩固其政权的合法性，就必须借助话语这个载体，通过一定的话语系统旗帜鲜明地表达出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言：“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语言也和意识一样，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产生的。”^① 意识形态是“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②。由此可以看出，意识形态和话语联系紧密，“话语‘说什么’‘怎么说’‘以什么身份说’，即它的内容、形式和倾向都映射着权力，而这种权力关系的系统再现，则成了意识形态”^③。一个国家为维护统治阶级利益需要以一定的话语来彰显自己的意识形态主张，并建构代表统治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另一方面，意识形态话语随统治阶级意识形态主张的变化，进行创新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德意志意识形态时论述道：“占统治地位的将是越来越抽象的思想，即越来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为每一个企图取代旧统治阶级的新阶级，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说成是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利益，就是说，这在观念上的表达就是：赋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们描绘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义的思想。”^④ 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包括我们这个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⑤。统治阶级为了维持统治的秩序，都会选择与本国国情和文化传统相适应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都需要生产出相应的意识形态来调节社会矛盾。也就是说，当世情、国情、党情发生变化，一国的意识形态话语亦会随之进行变化发展，会随着时代主题、历史方位以及党治国理政的变化不断获得新的语言元素与表达方式，创新意识形态话语体系。

2. 为何需要意识形态话语权

马克思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态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⑥ 作为以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意识形态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意识和思想。因此，没有意识形态话语权，一个国家或者政权也往往会丧失其存在的话语合理性。

意识形态话语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代表和维系着统治阶级及其政党的根本利益和价值追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不过是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不过是以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页。

③ 李兰芬：《我国道德话语权的现状及其对策》，《哲学动态》2008年第9期。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80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87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70页。

想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关系；因而，这就是那些使某一个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的关系在观念上的表现，因而这也就是这个阶级的统治的思想。”这说明意识形态实质上具有典型的阶级属性。同时，马克思恩格斯还进一步解释：“作为思想的生产者进行统治，他们调节着自己时代的思想的生产和分配；而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思想是一个时代的占统治地位的思想。”^①也就是说，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离不开意识形态的工具属性保障，统治阶级的意志和观念体系往往要通过意识形态反映出来。阶级性特征决定了一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只有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才能在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同时也支配精神生产资料，从而使整个国家和社会按照符合自身阶级利益的方向发展。

意识形态话语权具有鲜明的实践性，对于社会存在具有巨大的能动反作用。意识形态作为思想观念的上层建筑，既来源于客观的社会存在，又能对社会经济政治存在起着巨大的能动作用。马克思在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意识形态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的地位、意识形态的变革及其根据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意识形态是“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②。作为对物质世界的客观反映并由社会存在决定的“思想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框架内，产生同生产力发展以及生产关系状况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话语，与其他的社会结构因素发生相互作用，从而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各个领域体现出重要价值。实践性要素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政权只有充分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以发展保发声，以发声促发展，才能进一步推动经济社会的稳步和持续发展。

3. 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应如何为

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立足于科学的理论。马克思指出：“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③也就是说，一种理论必须对事物与问题从根本上作出阐明、解释和回答，使其具有真理性与科学性才能以理服人。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内蕴深刻，但从来不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和“绝对体系”。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指导人类社会的理论明灯；马克思主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更是决定了其真理性与科学性，“我们没有最终目标。我们是不断发展论者，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④。马克思主义始终立足于对客观世界包括人类社会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认识和革命改造，客观真理性是其力量所在。也正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与科学性，使得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既要理直气壮、旗帜鲜明，又要真正熟谙理论、掌握理论。

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必须实现理论的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具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现代社会中，意识形态各种形式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在其内在的历史继承中前行。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⑤因此，只有符合时代需求的意识形态才能成为居于主导地位的组织或社会集团的共同意志。由此，意识形态工作除了需要理论的真理性与科学性之外，还需要实现支撑意识形态的理论创新和发展。在当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78、1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0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61-56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1页。

中国，就是同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紧密结合，紧抓时代课题，回应时代课题，在人民群众生动实践中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只有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建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才能不断将意识形态的内涵和价值诉求转化为全社会普遍认同的主流社会意识，才能形成真正具有说服力的话语体系。

二、历史逻辑：掌握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担当

掌握话语权对于维护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意义重大。回顾历史，我们党在98年的发展过程中，意识形态安全总是面临各种风险挑战，意识形态话语权也不是在风平浪静的环境中就被轻易掌握，而是克服各种风险阻力，在与各种错误思想作斗争中，不断创新发展，这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传承与使命担当。

1. 坚定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擎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之“旗”

这个“旗”，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毛泽东发表的《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共产党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延安整风运动则在整体上提高了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多重措施推广马克思主义和坚定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1949—1951年，《光明日报》《人民教育》《文史哲》和人民出版社等报刊和出版社相继创办与成立，并成为宣传和传播中国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先后编辑和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等一系列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要求共产党员尤其是作为“关键少数”的领导干部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而“二百七十四名中央委员，及一千以上的高、中级在职干部都应程度不同地认真看书学习，弄通马克思主义”^①；在全国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为中心的爱国主义运动、土改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和整风运动，对帝国主义思想、封建主义思想、资产阶级唯心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进行批判；为了进一步完善党的思想宣传工作任务，毛泽东确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方针等，最终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和主导权，也为我国今后的意识形态安全工作铺垫了正确道路。

改革开放结束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治运动，改变了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局面和以前反映计划经济时代的话语体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进入恢复与重建阶段。其间，邓小平确立了解放思想与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只有解放思想，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我们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能顺利进行，我们党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理论也才能顺利发展”^②。这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回到了良性的阶段，成为改革开放之后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原则。在党的十二大上，他进一步提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

① 张静如等主编：《中国共产党通志》第2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3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43页。

论。”^① 在 1992 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他阐述了社会主义的本质，提出了“三个有利于”的标准。

进入 21 世纪，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进入了创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在“8·19”讲话中提出了“两个巩固”，即“宣传思想工作就是要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②；在十八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他指出，领导干部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的看家本领；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他指出，“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③；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他指出，“马克思主义所阐述的一般原理整个来说仍然是完全正确的”^④，我们要不断从中汲取科学智慧和理论力量，与时俱进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创新话语体系，使它永葆生机。

正因为我们党牢固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结合中国革命和社会建设的实际，从毛泽东思想到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再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了一次全方位的创新。概言之，即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开放性、时代性引领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有效发挥其对意识形态的引导和整合功能，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

2. 正确认识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严峻性，紧绷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之“弦”

这根“弦”，就是指意识形态领域的长期斗争和较量。意识形态斗争的本质在于争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与主导权。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增强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和“反马”思潮进行斗争，从而在不断的对话、交锋和批判过程中不断锤炼提升。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初就清醒地认识到，在意识形态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必然存在长期的斗争。他在 1957 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⑤“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⑥，既论析出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性、曲折性，又强调在意识形态领域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来战胜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性。

改革开放以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拜金主义、利己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经济私有化、新自由主义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造成了严重的冲击。面对意识形态领域内外部环境的纷繁复杂，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高度重视在新的历史条件和环境下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问题。邓小平指出：“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⑦ 20 世纪 80 年代，国际国内出现了“非毛化”的右倾错误思潮，借毛泽东晚年错误来全盘否定毛泽东思想，否定社会主

①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年，第 153 页。

③ 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1 页。

④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 2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年，第 25 页。

⑤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0 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 7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231 页。

⑦ 《邓小平文选》第 3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344 页。

义制度，否定党的领导。针对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杂音、噪音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言论，早在改革开放伊始的1979年，邓小平就提出“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思想。1983年，他在会见印度外宾时明确指出：“我们要特别注意建设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①1986年，邓小平又指出：“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②1992年的南巡讲话中，邓小平再一次强调“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战略方针。而在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四项基本原则，即“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③。他还多次强调要辩证地看待“左”和右的转化问题，指出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针对性地处理这两种思想造成的危害。江泽民指出：“在意识形态领域，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思想不去占领，各种非马克思主义、非无产阶级的思想甚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会去占领。”^④胡锦涛也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社会主义大国，我国将长期面对发达国家在经济科技军事等方面占优势的压力，将长期面对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国实施西化、分化战略的压力。”^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党情，高度重视意识形态斗争的重要性和严峻性，强调：“苏联为什么解体？苏共为什么垮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十分激烈。”^⑥可以说，当前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

由此可见，我们党历来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尖锐性。今天，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作为世界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作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并即将迎来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兴大国，必然会长期面临西方国家的围追堵截和价值渗透。这种斗争过去存在、现在存在，将来仍会存在，如果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警惕，就难以在激烈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斗争中掌握主动。

3. 牢牢掌握正确的舆论导向，筑牢维护意识形态安全之“地”

这个“地”，就是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各种发声阵地。话语的掌握，同时也是舆论的掌握。我们党历来十分重视掌握正确的舆论导向，通过各种载体传播党的意识形态路线、方针、政策，发挥舆论的引导功能。

毛泽东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就要求，各中央局和中央分局要“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务使通讯社及报纸的宣传完全符合于党的政策，务使我们的宣传增强党性”^⑦。毛泽东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曾主持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一职，他以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名义创办出版了《政治周报》。此后，在毛泽东的努力下，党中央机关刊物《共产党人》于1939年10月4日正式创刊。延安整风期间，毛泽东更是亲自抓《解放日报》的改版，将其从“社报”变为“党报”，从“不完全的”办成“完全的”党中央机关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毛泽东强调要重视意识形态工作中新闻媒体的重要作用，多次强调必须要“政治家办报”，促使这一重要原则成为全党共识。1949年，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改为中共中央机关报，并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宣传，同年北京新华广播电台更改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这些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全国范围内的理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4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73页。

④ 《江泽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64页。

⑤ 《胡锦涛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37页。

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113页。

⑦ 《毛泽东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54页。

论宣传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推广奠定了舆论导向基础。在此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借助广播、电影、报纸出版物等多种舆论宣传阵地，成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热潮，为掌握话语权缔造了前提条件。

改革开放后，面对西方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邓小平强调加强新闻媒体等思想舆论阵地建设至关重要，指出“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党和人民群众团结一致的威力，宣传社会主义中国的巨大成就和无限前途”^①。江泽民强调思想文化阵地的一致性，要从理论建设、新闻、期刊、美术、小说、影视等多方面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胡锦涛针对进入21世纪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建设面临的新问题新特点新挑战，强调必须坚持党性原则，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并明确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意识形态安全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我们必须充分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③“新闻舆论工作者要增强政治家办报意识”^④，“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职责，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⑤。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已经成为当前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互联网是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主阵地、最前沿，“要增强阵地意识，敢抓敢管，敢于亮剑……要把网上舆论工作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来抓，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⑥。

正因为我们党坚持守住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阵地，始终强调思想引领和舆论导向，不断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力与话语权，才真正有效发挥出意识形态工作在全党全国全社会的凝心聚力与导向作用。

三、实践逻辑：提升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须基于问题意识多措并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建设既要面临经济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意识形态的渗透，又要面临国内社会思潮多元多样的冲击，还要面临大数据时代的网络环境。外部、内部以及网络环境三个层面交织与挑战，使得提升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成为一项系统而复杂的工程。从问题意识出发，需从话语主体、话语体系、话语载体三个维度着力提升话语权维护意识形态安全。

1. 话语主体要“理直气壮”，敢于“言马”，解决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态度问题

所谓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即话语由谁来说、由谁来掌握。整体而言，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知识分子、意识形态工作者、人民群众等。主体的坚定性决定了话语权的有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事关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必须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⑦这一精辟论断对意识形态话语权主体提出明确要求，面对错误言论和错误思想，话语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55页。

② 《胡锦涛文选》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537页。

③ 《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8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333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6页。

⑥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465页。

⑦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155页。

主体必须要敢于理直气壮地亮出鲜明的立场和态度。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的主流和非主流思想同时并存，先进和落后激荡交织，昂扬向上的主旋律和喧嚣刺耳的杂音噪音相互影响，“红色”“黑色”“灰色”三个地带互相交错碰撞。面对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情况，必须要有坚定的政治定力和鲜明的政治立场，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坚定毫不含糊的态度和立场。这种态度和立场就是要敢于“发声”，对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推出各种版本的“社会主义失败论”“意识形态终结论”“意识形态趋同论”“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亦或“非毛化”“非邓化”“否定英雄”“抹黑榜样”等错误观点和言论，对互联网空间的噪音杂音，要敢于抵制、敢于批判、敢于辩驳，主动“发声”，划清是非界限，澄清模糊认识。

“话语权一定要牢牢地掌握在马克思主义的手中，话语权的旁落必将削弱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①话语权的主体要敢于“亮剑”，认清大局、大势、大事，做到拥护什么、反对什么，心里“有本账”，敢于与歪曲、否定党、国家、民族的历史的言论，和任何传播政治谣言、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行为做斗争。坚决反对出于明哲保身的目的，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绕道而行、态度暧昧，坚决抵制出于“爱惜羽毛”的考虑，当起“开明绅士”，坚决批判用“不争论”“不说话”为不作为来开脱。

2. 话语体系要“顺理成章”，能于“言马”，解决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问题

话语体系是话语权的核心要素，只有建立科学和创新的话语体系，才能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中“顺理成章”、以“理”服人。面对来自四面八方的不同说法、繁杂声音，如何作出清晰判断，如何清楚回应诉求，是对话语体系的科学性和话语主体修养与素质的直接考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前进道路上，我们一定要加强全党的理论武装，要“更加自觉、更加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学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要深入学、持久学、刻苦学，带着问题学、联系实际学，更好把科学思想理论转化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物质力量。共产党人要把读马克思主义经典、悟马克思主义原理当作一种生活习惯、当作一种精神追求，用经典涵养正气、淬炼思想、升华境界、指导实践”^②。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断提升意识形态话语体系的科学性，才能练好看家本领，解决好提高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能力问题。

话语体系的创新，一方面来自理论的创新和提升，来自持续推进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马克思主义是经实践证明了的科学理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被实践检验了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行动指南和锐利思想武器。只有通过不断创新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坚持将创新理论成果指导实践，才能从根本上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才能从源头上发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在话语体系创新中的功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为发展马克思主义作出了中国的原创性贡献，是当今时代最现实、最鲜活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理论源泉。

话语体系的创新，另一方面来自基于实践的话语内容的与时俱进。意识形态是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特殊意识。“马克思有他那个时代的语言，我们有我们时代的语言。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语言，新时代总有新语言。”^③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世情国情党情和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发展阶段、发展环境、发展条件和发展目标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基于这一实践

① 周小毛：《马克思主义的时代问题》，《求索》2018年第6期。

② 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25-26页。

③ 《邓小平文集（一九四九—一九七四年）》（中），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390页。

基础的话语体系内容也要随之实现创新和发展。这种话语创新并不是刻意的标新立异，也不是创造一些新奇的概念，而是一种基于实践基础上又在实践中被成功检验的新的话语表达。毛泽东通过“实事求是”来阐明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涵，邓小平通过“摸着石头过河”来揭示改革开放方法论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用“中国梦”一词带动和激发了全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用“缺钙”“软骨病”来比喻理想信念的缺失，用“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来强调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我们党正是通过创新话语内容，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从而发挥强化意识形态认知、提升意识形态认同的重要功能。

3. 话语载体要“守正出新”，善于“言马”，解决好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方法问题

话语是意识形态的载体，而话语本身的有效表达又需要成功的载体来实现。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中的话语载体，即主流意识形态怎么传播，通过什么平台、渠道进行传播，是意识形态话语权建设和维护意识形态安全需要解决的方法问题。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在传播的渠道、方法和手段上大幅提升，但就话语表达的有效性而言，仍显得方法不够，略微滞后，存在“声音不够大”“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传开叫不响”等多重话语困境。本立而道生，守正才能出新。话语表达的有效性，往往也就决定了意识形态贯彻的充分性。创新话语载体，是解决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方式方法问题的重要因素。

话语载体的创新，实质上就是要“善言马”的问题，就是要掌握发声技巧，完善发声平台，提高发声水平。使用受众愿意听、喜欢听、听得懂的话语表达方法，创造受众想用、正在用、喜欢用的话语表达符号，实现话语传统表达平台与现代网络方式的结合，这些是话语载体创新的基本要素。因此，这种载体要实现三个方面的结合。其一是中国声音与世界声音的有效对接和结合。比如“一带一路”建设，就不是中国的“独奏”，而是在开放共享包容中的世界“合奏”。其二是理论与大众的结合。“大道理”在“小叙事”中往往能更加潜移默化、深入人心，在具有亲和力和形象化的语言表达方式中，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影响力和认同度往往更为提高。其三是传统传播形态与新媒体传播的结合。意识形态话语的传播，既需要重视发挥影视、书籍、美术、音乐等各种传统媒介的功能，在信息时代更不能忽略网络、自媒体等新兴媒介的巨大传播影响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三十讲》，北京：学习出版社，2018年。
- [2] 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年。
- [3] 《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
- [4] 夏银平：《当代意识形态论》，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
- [5] 陈曙光：《中国时代与中国话语》，《马克思主义研究》2017年第10期。

（编辑：刘 影）